

读林昭十四万言书

傅国涌

发布时间:2013-04-29 05:56 作者:傅国涌 字号:大 中 小 点击:11649次

对自由、政治与生活，林昭都有自己完整的一套看法，她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呢？



林昭（1932. 12. 16-1968. 4. 29），原名彭令昭，苏州人。在 1957 年的反右运动中因公开支持北大学生张元勋的大字报而被划为右派。1960 年起以“反革命罪”被长期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。1968 年被秘密枪决。

1968 年 4 月 29 日，不到 36 周岁的北大学生右派林昭在上海被秘密枪杀。两天后，公安上门向她母亲索取 5 分钱子弹费。1980 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判决她无罪。1981 年，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宣布给她平反。

40 年后，面对林昭的牺牲，世人不仅佩服她的勇气、壮烈和决绝，更惊讶她的思想。在整个民族几乎都陷入盲从、迷信和狂热的时代，她没有停止独立思考，在狱中没有纸和笔的情况下，她以血为墨，以白床单为纸，写下了大量血书。现在，我们只能看到极不完整的一部分。

超越时代的思索

笔者有幸，读到了林昭在 1963 年写给《人民日报》编辑部的长达 14 万言的信（现保存于林昭亲友手中，未刊稿）。她在其中提出的观点，她对时代和中国命运的思考，她使用的语言，都超越了同时代的人。她抛弃了当时无所不在的弥漫着火药味的斗争话语，找到了自己的话语方式，用自己的语言概括了那个时代。

她的批判不是破坏性的，而是建设性的。她的同伴黄政回忆，1962 年林昭在谈到广大农村饿死人时，就说人民公社不合国情、不合情理，应当及早解散，在农村实行耕者有其田；对于“割资本主义尾巴”，她提出应当允许私人开业经营，主张私人办厂是她的罪名之一；她说要改变闭关锁国的政策，加强与世界的联系，包括引进外资，借外债加速经济和科技的发展。她还提出了地方自治等设想。这些今天有些已变成现实的想法，在当时的中国无疑是空谷足音。

她最终摆脱了简单的仇恨意识和你死我活的敌对思维：“我们反对什么，那是很清楚的，可是我们到底要建立什么呢？要把自由的概念化为蓝图而具体地按照它去建设生活，可不是一件简单轻易的事情，特别是要在这样一个广大分散痼疾深沉的国家里来建设它，就更其复杂艰巨！……只要生活中还有人被奴役，则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，那奴役他人者同样不得自由！然则身受着暴政奴役切肤之痛、再也不愿意作奴隶了的我们，是不是还要无视如此悲惨的教训，而把自己斗争的目的贬低到只是企望去作另一种形式的奴隶主呢？奴役，这是可以有时甚至还必需以暴力去摧毁的，但自由的性质决定了它不能够以暴力去建立，甚至都不能够以权力去建立！”

她在观念上找到了新的出路，对自由、生活、政治都有了全新的认识。她说：“高尚的目的根本不需要、更加不可能用卑鄙的方法去达成，只有卑鄙的目的才能够与卑鄙的方法相得益彰地‘配套成龙’。”

从右派到“反革命”

林昭不是天上掉下来的，她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一步步走过来的，她也有过轻信、迷狂和个人崇拜，甚至不惜与家庭决裂。直到 1957 年之后，她才开始反省，开始追问，开始寻找，最终回归了良心，回归了人的本性，回归了生活本身。

1957 年 5 月北大鸣放时，她并无右派言论，只是在张元勋等人遭到围攻时，挺身而出，说了几句公道话。她也参加了学生刊物《红楼》开除张元勋的签名。但终未能幸免于右派的命运。她在写给妹妹的信中说：“当我加冕成为‘右派’后，你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体会我的心情的，我认为我热爱党的程度是压倒一切的，没有任何事物可以与之相比拟。我不能忍受它对我的误解，而且误解得那样深。”

1958 年 7 月，当右派同学刘发清痛苦得吃不下饭时，她开导说，自己一开始也是吃不下、睡不着，还自杀，现在想通了：“这不单是我个人的命运问题，北大划了多少个右派？全国有多少？”“反右斗争还在全国进行，它的性质、它的意义、它的后果、它对我们国家、对历史有什么影响？对我们自己有什么教训？”

我现在还搞不清楚。但我要认真思考，找寻答案。”

她不顾自己的处境，为大跃进等原因造成的大饥荒忧心如焚，和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右派一起办了油印刊物《星火》，坚持说出真相，并给领导人写信，试图以微弱的力量阻止悲剧的蔓延，终于以“反革命”罪被捕入狱。

她通往 1968 年 4 月 29 日的路，就此开始。

“我是个人”

自从 1960 年入狱，林昭就对自己的处境有着清醒的认识，她在这封长信中写道：“我很知道反抗者在我们的制度下意味着什么，而走反抗者的道路在我们的制度下又将遇到些什么。”对于自己的结局，她早有预感，做好了心理准备。1966 年，她对前来探监的张元勋说：“顶多也就是死！他们杀机已定，哀求之与痛斥之，其结果完全相同！”1968 年，当她被折磨得只剩下不到 70 磅，大咯血，最后一次被送进监狱医院时，对她怀有同情的医生悄悄说：“唉，你又何苦呢？”她则轻声答以“宁为玉碎”。

她热爱生，但她只能作为一个人活着。她有个说法，祖先已从猴子变成人，“我这不肖子孙无论如何，断难再从人变为猴子”。

她不愿意任人摆布而苟全，也就是不愿意变成人家手里的一张牌。她对审讯者说过在狱中做的怪梦：“魔术师跳上跳下，不断对我挥舞着魔棍，并指着一个木框子叫道：‘进去，进去！变成我的一张牌——我正缺一张黑桃皇后！’但我叫得比他更响：‘我是个人，知道吧？不是谁手里的牌！黑桃皇后？！你就是让我当金花菜老 K，我也不干！’”“我是个人”，这是她的底线，不容突破，不可妥协。她在忍无可忍、多少镣铐加身的情况下，对狱警发出的最严厉的责问也只是：“你们究竟是不是人！？是不是人生父母养的！？”

她说自己的思想和方法等都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东西，但她同时说：“我不曾理性地去考虑和制订它们：这与其说是由于政治上的幼稚和不成熟，毋宁说是由于青春时代刚毅热烈的气质！虽然这二者也许不可分开。过去对着人们我也不止一次坦然承认：这个青年反抗者所作的诸般战斗行动，大都源于直觉——感性，而不是源于理性。理性在我只不过是或用以检验、反省以至理解感性的决定罢了。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加深感性，然而绝对无法代替感性！”

这段自白是理解林昭最后的道路和抉择的一把钥匙。她从来无意于做政治家，也做不了那种政治家。她被秘密枪杀前，曾几次在狱中自杀未遂，其中一次是 1964 年 2 月 5 日，因不堪凌辱，吞药皂求死，急救过来，狱方责怪她：“你也是搞政治的，怎就没有点儿政治家风度？”她回答：“可惜林昭不是政客”，“本来不懂啥子政治，到了被逼无奈闯进这滩不是人下的浑水，初志仍不过是凭着书生本色的一领青衫一腔热血。……要作个有‘风度’的‘政治家’，或者干脆地说：作个专门玩儿利害的冷酷的政客，自认不仅完全不是料坯，更毫无培养前途！”

“我怎么能认错”

她致死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她的不认错，多位同学都提到，“反右以后，她死不认错，她是北大惟一不认错的”。入狱之后，“有人对她说：你只要承认一句自己错了，就可放你出去。她回答道：‘不，我没有错，决不向邪恶低头。’她母亲劝她“孩子，你就认个错吧，不然，他们会杀死你的”。她回答：“我怎么能认错！我没有错！”

她在信中自述：“林昭这份难移的该死的本性就是这样！——遇到外来的侵犯镇压之类，首先想到的永远只是反抗而不是其他什么！”“不怕你们把林昭磨成了粉，我的每一粒骨头渣儿都还只是一颗反抗的种子！”狱中人们都说她“有那么股子劲儿”，她自称这不过是“一股子书生气”，也就是她自己说的“感性”，这是她全部的力量源泉之一，本也是人身上最可宝贵的东西之一。

“有理都是林昭的”

1962年，林昭在保外就医期间为什么要给北大校长陆平写信？她在狱中为什么要一而再地给上海市长、给《人民日报》写信？不是因为她幻想会有什么结果，她解释说：“我确知我的呼喊不会有任何回声……然而林昭必须对自己的一切行为包括语言负责！有了这封给北大校长的信介于其中，将来编起文集来，从‘思想日记’到‘我们是无罪的！’，再到‘我呼吁，我控诉！’，这期间的一贯脉络就极其分明而一望可知，而且这年轻人完全占着个‘理’字！……没理都是你们的！有理都是林昭的。这个年轻反抗者不仅处在有利于占理的地位上，而且行事凡百皆先求得占理！理直则气壮！三人抬不过‘理’字儿！有理且能打得大公，况其余乎！”

她对审讯者说：“利害可以商榷，是非断难模糊！”“一切皆可引相对论，惟是与非断不能二一添作五。”“是非之间绝无任何调和折衷的余地”。所以她只能选择向死而生。她骄傲地宣称自己作为反抗者所持的态度“相当光明磊落，甚至允称俯仰无愧！——可对世人，可质天日！”

回归人性

在1957年以后的11年中，她之所以一步步地能在观念上攀得更高，走得更远，甚至把同时代其他人都甩在后面，关键还是因为她人性中最真实、最柔软、最美好的一面从来没有被磨灭，反而在严酷的现实中被激活、被唤醒，她向往人的生活的愿望，决定了不能苟且、不能屈从。加上她天性中就有的对自由的追求和她认死理的气质，这些合在一起，决定了她的命运。

她几次说：“因为这一份该死的‘人性’，正是造成林昭本身之悲剧的根本原因！”“作为林昭的个人悲剧，那是也只好归咎于我所怀抱之这一份该死的人性了。”她的全部追求包括她的牺牲，归根结底，可以说都根源于她的人性。

不了解这一点，就无法理解她的宁为玉碎，她这样选择不是因为否定生活，恰恰相反，是因为她太珍视生活、太珍爱生活了。她之所以反抗到底，完全基于自己对生活的理解。她说自己反抗的全部根据只是一条天人共许的铁则：“被践踏的公义必须得到伸张！这也就是我常爱提说的生活之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之一部分。”

她憎恶与人的生活相对立的一切，她在送给一位同学的照片背面题了8个字：“什么是美？生活本身。”她理解的生活不是一个空洞的不着边际的名词，而是有着美好而充实的内容，在她的同学、友人的记忆中，她是一个很懂得生活并且会享受生活的人，一个有着丰富情感的人，她爱喝酒，爱吃，在狱中她给母亲的信中还能一口气开出几十种不同吃法的食物来，她喜欢跳舞，会随便采摘野花戴在头上，她会自己动手裁剪衣服……她对生活一直保持着美好的感觉。

幼承庭训

从林昭的家世、成长历程来看，她深受母亲许宪民的影响，而她母亲又深受她大舅许金元——一位在“四一二”事变中被杀的早期共产党人的影响，她妹妹说她身上有“家传的政治基因”。她多次讲到自己幼承庭训，其中之一“就是必须对自己的一切行为负责”，从来不怕担负自己应负之责。她在读中学时就参加了左倾的“大众读书会”和“大地图书馆”，类似中共的外围组织，读过马列的书和毛泽东的《论联合政府》、《新民主主义论》等手抄本。1948年暑假，她甚至做过三天地下党员，只是因为对秘密工作原则缺乏认识，失去了组织关系，为此懊悔多年。她满怀希望地迎来1949年，一心上进，为此不去上大学，不惜跳窗从家里出逃，还曾无中生有地揭发过母亲。

她的父亲彭国彦，受过英国教育、“沾上了威斯敏斯特的民主气息”，在国民党时代有过从政经历，一直清廉耿直、洁身自好。多年以来，父亲在林昭心目中只是一个“反动官僚”，直到她成为右派，回到家中后，才与父亲有了更多的交流，她对父亲产生了愧疚、亲情和敬仰。林昭第一次入狱后，她父亲选择了自杀。1962年，同学羊华荣见到保释中的她，发现她头上戴了朵小白花，问她为谁戴孝，她说是父亲。“我说：过去你不愿提你的父亲，现在怎么成了孝女，她只是笑笑。”父女之间的这些交流在她身上开始生根。她第二次入狱，到精神病院做鉴定，她对院长粟宗华说：“我父亲曾对我讲，利用青年人的纯真热情搞政治是最残酷的。……历史将宣告我无罪。”

她读过《扬州十日记》，深刻地觉察到民族的悲剧“仍不过是历史之一贯性的延续”，“几名清兵就可以赶着一大群中国人去宰杀，——像赶猪羊似地驱叱而行；到了地方喝令跪下便一齐跪下，听待人家拿着刀从前排逐一杀起而竟俯首帖耳得没有一个敢动！唉！中国人！中国人！！中国人啊！！是故当读着辛亥革命先驱者陈天华的《警世钟》、《猛回头》，秋瑾的遗诗以及林觉民《与妻书》等时，这个未失赤子之心的年青人（按：此为林昭自称）不知多少热泪如注、纵横狂流沾湿篇幅！”她由衷地景仰这些杀身成仁的先行者，并自觉地接续他们的精神脉络，这是她重要的精神源头之一。但仅有这种资源，她只能走向以暴易暴的反抗之路。

为了迷途重归的良心

林昭早年就读的苏州景海女中，是一所教会学校。可以说，是基督教给了她内心的光亮和力量，使她流自己的血，却不想以血还血，而只是以自我牺牲的方式守护她深爱的一切。即使对于向她直接施暴的人，她心中也没有产生你死我活的念头。

1949年，她从景海女中毕业后，脱离了教会。1951年参加土改工作队时，她曾以“中央的通知”名义警告牧师，凡进行土改的地区应停止一般宗教活动。打成右派后，她开始逐渐回归，右派同学羊华荣跟她议论无神论和宗教等话题，“有次谈到基督教时，她说：你不要贬低上帝，我信奉基督教。”

她曾讲过林肯救一头陷入泥沼的猪的故事，有人称赞林肯，有人说林肯做得不值，而林肯只是回答：“我不是为那口猪，我为我自己的良心！”她称自己所做的一切，也只是为了“迷途重归的基督徒的良心”。

1958年到1959年，她在人民大学资料室监督劳动时，每个星期天，她几乎都要带朋友甘粹到北京王府井大教堂做礼拜，并给毫无宗教知识的甘粹讲圣经故事。甘粹认为：“她从小信的是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，反右是不平等的，不公平的。为了这个不公平，她出来替他们说话。”

她在狱中一度和基督徒俞以勒同室，成为好友。这大概是她在狱中最开心的时光。她自称是“一个奉着十字架作战的自由志士”，在追思被刺杀的美国总统肯尼迪时，她说：“作为基督门徒，我们各人诚实的灵魂无论何时永远共同呼吸、居住而活跃在基督的爱里。”

她自知有肺病，但不愿治疗，她说：“作为基督徒，我的生命属于我的上帝——我的信仰，我的教会——我的神灵，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我是愿意甚至希望从自己中学时代的导师、带领我受洗进教的美国传道士那里得到对于肺病的药物治疗的。”“既然我的生命属于上帝，而且已经活过那么些艰难困顿至于严峻地残酷的日子，那么，无论病躯怎么衰弱，假如上帝要使用我而要我继续活下去，我一定可以活得下去！.....而假如上帝需要我成为一个自觉的殉道者，我也只会发自衷心地感激施赐与我这样一份光荣！”很显然，她把自己当作一个殉道者，在信仰中获得升华。

北大传统

我们同时不能忽略她的另一个思想资源，那就是北大传统对她的影响。1954年，她以江苏省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，深受古典文学教授游国恩的赏识，建议她改为文学专业。因为她的文学才华，她成为北大校刊、《北大诗刊》和《红楼》杂志的编辑、编委，在北大度过了愉快的三年。她曾写过一诗《沿着五四的道路》：“北大的老钟，它曾在我们的时代的交响乐章里，奏了一支烈焰狂飙般的激情奏鸣曲.....生生不息，代代相传。”

蔡元培、李大钊这些北大先驱在她心目中有着沉甸甸的分量。她在成为右派、自杀获救后，愤怒地质问：“当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校长时，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府去保释‘五四’被捕的学生，现在他们却把学生送进去，良知何在？天理何在？”她在 1962 年暂时出狱期间给北大校长陆平写信，无非也是要重申北大传统。

在 1957 年的风暴来临前，她在北大的《红楼》杂志第三期发表过一篇《种籽——革命先烈李大钊殉难三十周年祭》，其中引用了李大钊早年的几段话：

禁止思想是绝对不可能的，因为思想有超越一切的力量。监狱，刑罚，苦痛，贫困，乃至死杀，这些东西都不能钳制思想，束缚思想，禁止思想。……你要禁止他，他的力量便跟着你的禁止越发强大，你怎么禁止他、制抑他、绝灭他、摧残他，他便怎样生存、发展、传播、滋荣……

真正的解放，不是央求人家，“网开三面”地把我们解放出来，是要靠自己的力量，抗拒冲决，使他们不得不任我们自己解放自己。不是仰赖那权威的恩典，给我们把身上的铁锁解开；是要靠自己的努力，把他打破，从那黑暗的牢狱中，打出一道光明来！

这些话曾引起她深深的共鸣。这些思想资源也化入了林昭年轻的血液之中。后面这一段，她成为右派后还曾抄在日记里，从她最后的抉择来看，她走的无疑也正是这样一条自我解放之路。思想自由，正是北大最珍贵、最重要的传统之一。林昭无疑也是属于这个精神谱系的，她是这个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。

1957 年春天，在纪念李大钊殉难 30 周年时，林昭曾写下这段话：

鲁迅先生说：路是人走出来的。但如果没有第一个，也便没有后来的，也仍然没有路。而那第一个遵着遥远的火光，走进没有路的地方去，直到倒下去，还以自己的鲜血为后来者划出了道路的人，将永远、永远为我们所崇敬。只要这条路存在一日，走在路上的后来者，便再也不会忘记他的姓名！

整整 40 年后，我们同样可以用这番话来纪念她。